



地方控制与人才培养：抗战时期国民党的西北干部训练

王 龙 尚季芳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抗战时期，国民党因“抗战建国”的需要，在各省开展干部训练，培养人才，巩固地方政权。鉴此，西北干部训练团因应设立，负责西北各省干部训练相关事宜。西北干部训练以钳制马家军阀、遏制共产党、规复新疆为主要目标，但也着力于培养提升各级行政干部的素质，充实西北开发建设人才。西北干部训练的内容涉及精神训练、政治训练、军事训练和业务训练等方面，训练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然而由于国民党权势的衰弱，内部矛盾的加剧，加之各地方实力派的暗中阻挠，最终导致训练成效不佳，致使国民政府的地方治理难如人意。

关键词：抗战时期；国民党；西北地区；干部训练；地方控制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733 (2019) 06-0029-08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为适应战时需要，大力推行新县制，以期实现地方自治与抗战建国的完成。若此，须建立健全基层治理制度，培养高素质的党政干部。因此，地方行政干部培养成为当时国民政府重要任务之一。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开展全国各类干部训练，5月5日在武昌成立中央训练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国干部训练工作，并组织中央训练团调训全国各类中上级干部，同时“对各省训练工作并力谋整理推进，以期达成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之目的”^①。1939年3月，中央训练团迁至重庆，干部训练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目前学界关于国民党干部训练的研究较多，然而对西北干部训练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事实上，西北干部训练有其更复杂的时势背景，乃是国民政府控制诸马、收复新疆、开发西北的重要一着，以此为切入点可窥视国民政府治理西北的能效和不足。

一、西北干部训练团成立的背景

事实上，早在1938年1月14日，国民党中央将“甘肃全省中小学校职员训练团”改组为“西北训练团”，蒋介石自兼团长，甘肃省教育厅厅长葛武桀为教育长，开展西北干部训练。9月，改任胡宗南兼任教育长，罗历戎为代理教育长^②。10月，国民党政府从武汉西迁重庆后，陕西、甘肃成为西北大后方，战略地位益显重要。当时，胡宗南率第17军团驻防关中，担负屏障西北重任。他意识到“甘、宁、青各省民族关系复杂，政情特殊，派系纷呈，地方势力雄厚，颇难驾驭，便就商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朱、胡共同向蒋介石呈请成立一个干部训练机构，一以调训当地原有军政干部，逐步统一他们的思想；一以培养训练青年干部，为今后西北军政干部的补充。”^③朱、胡的建议很快得到蒋介石的批准。1939年2月，蒋介石电令，改“西北训练团”为“西北干部训练团”，



蒋仍兼团长，但指派甘肃省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等为副团长，并指派朱绍良为代团长^[4]。该团负责训练甘宁青等省中级以下干部，并兼办甘肃省行政人员之训练^[5]。1941年原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西北干部训练团和西安战时工作训练团改隶中央训练委员会^[6]，其地位进一步提升。因着西北干部训练指导机构的就绪，干部训练工作逐次展开。

国民党西北干部训练的开展亦有其特殊的政治考量。斯时国民党政权虽然形式上实现了全国统一，实则中央与地方依然相互博弈，掣肘较量。西北形势错综复杂，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将西北的政治势力分为五派：(1) 国民党中央；(2) 共产党；(3) 蒙古各旗盟；(4) 回回；(5) 新疆盛世才。他指出：“在此五大系属之间，倾轧时间，未能真正熔为一炉。而各个系属之间，又意见分歧，互相磨擦。且民族关系复杂，界限未除，动多阂阻不安之象。凡此情形，既有妨害抗战军事之进展，又适予敌人挑拨诱惑之罅隙，危机四伏，实应早日予以注意者也”^[7]。吴氏之论道出了西北问题症结所在。

甘肃省省政府主席是国民党打入西北的一根楔子，蒋介石意图通过甘肃控制宁、青，进而收复新疆。派往甘肃的朱绍良、谷正伦等人虽说是蒋之干将，治甘成效甚宏，但甘肃在很多方面的建设仍不如人意。如党的建设，甘肃“省、县党部有机关无党员，因为从没开过党员会或关于训练的文件，党员和党无关系，等于无党员”^[8]。朱绍良也感叹道：“目前党组织涣散，特别是下层组织的松弛，是无可讳言的。区分部无工作，小组亦未建立起来。党员毫不重视党纪，不承担党的工作，不缴纳党费，因此重建党组织问题，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问题。”^[9]党组织建设的涣散，严重制约着其执政理念的贯彻落实。就驻军和干部而言，人员缺乏、纪律松弛、政治信念缺失。蒋介石认为“甘肃驻军缺额之多，出乎意外，河西中央驻军之纪律精神，反不如往日二马部队，

可知中央军之腐化日甚一日，思之危俛莫名，忧惶无已”，而“人才缺乏，干部难得，最足忧虑，奈之何哉”^[10]。蒋氏之忧虑反映了甘肃军界和官场不振的真实情景，只有急起图之，培养干部人才，方为切要之举。

在宁夏和青海两省，“宁马”、“青马”军阀具有绝对权威，“回族领袖服从中央，而军民只知领袖，不知中央”^[11]，俨然成为“马家天下”，国民党政权不能有效地实施控制。为消解地方派系势力，国民政府希冀“通过举办西北干部训练团，分批调训这些派系的干部，虽不能完全解决派系问题，但可以同这些干部建立关系，掌握情况，便于日后掌控或驾驭”^[12]。

新疆形势亦不容乐观，盛世才上台后，其政治立场摇摆不定，与苏联关系密切。而新疆“居高屋建瓴之势，得之足以屏卫中国，不得则关陇隘其封，河湟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13]。新疆之得失关乎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也关乎着抗战前途。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曾一度视苏联为靠山的盛世才开始投靠国民党。此时，蒋介石意图趁机解决新疆问题，建立对新疆的全面统治。为此，国民党中央起初在新疆设立政治干部训练班，之后于1943年设立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开展干部训练。时人评论道：“新疆是西北国防长城，抗战后方，同时也是国际交通要道，尤其是建国基础的一部分，因此，它对于抗战建国，关系至为密切，所以在新环境，新条件下的新疆今后干部训练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14]质言之，新疆的干部训练既是国民党出于对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国防安全的考虑，也是中央政权实现对新疆统一的手段之一。

与此同时，地处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共产党被国民政府认为是“心腹大患”，西北干部训练的又一目的则是防范共产党。马继援认为“陇东地居要衡，东制关中，北控三边，据甘肃之门户，为西北之锁钥，而物产之丰，人文之盛，尤为三陇冠。惟以共匪窃据陕北，称兵作乱，时思染指



陇东，故特召集陇东各县在乡军官，施以短期训练，以备自卫队干部之任。”^[15]

新县制的推行，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地方干部，而各省县级储备干部缺额甚大，并不能满足新县制组织的需要。在“西北边陲的甘肃，缺乏人才，尤其重要”^[16]，即便在甘肃“各地县府的官吏，实在不容易找到几个真正能干，而又肯干的人”，多数干部“不是自鸣清高，不欲过问（县政），即群趋于朝，藉求显达”，结果是“没有人肯干县政”^[17]。县一级人才匮乏，业务素质低劣，导致效率低下，政令不畅。

随着抗战的进行，西北战略地位日益提升，蒋介石认为“民族发祥在西北，民族复兴亦在西北”^[18]。他还说：“现阶段抗战形势，并不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与沿江沿海间交通地带之弃取，实重在策动全面抗战，持久抗战，与争取主动之地位，而西北西南诸省为今日抗战重要之策源，是以西北西南之民众，对于抗战建国所负责任尤大。”^[19]蒋介石以上论述虽有勉励军民之意，实则是对西北战略地位的真实认知。西北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是抗战时期中国重要的国际运输通道，苏联作为中国主要援助国，其大量物资通过西北运输到前线。

总之，鉴于西北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复杂的政治情势，如何控制西北社会，开发建设西北，成为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重要命题，而训练忠实于国民党统治的干部人才，充实地方社会，改造地方基层政权则是重中之重。

二、干部训练的实施

干部训练的实施，需遵照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颁发的训练大纲及训练纲目，制定训练工作计划，具体细则由各省计划制定。实施内容包括受训学员选拔与调训、训练教材及编审、训练课程及科目、教学方式与成绩考核等。

1. 学员选拔与调训

学员在受训前要进行严格审查和选拔。以甘肃省会计人员训练为例，规定“受训学员额定六十名，凡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四十岁以下具有高

表 1. 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西北干部训练团
第一大队第三队政干班第六组学员简历表（部分）^[24]

姓名	年龄	籍贯	学历	经历	现任职	永久通讯处	备考
刘佩林	34	甘肃平凉	中学肄业	曾充副官连长营附等职	平凉山货工会书记	西安北大街兴盛西	
张玉源	25	甘肃庆阳	中学肄业	曾充队长联保主任等职	庆阳县党部干事	西峰镇永胜街北	
董国云	25	甘肃秦安	高小毕业	曾充队长联保主任等职	秦安商会书记	秦安东山街天盛巷	
李登智	22	甘肃酒泉	师训班毕业	曾充教员	酒泉商会书记	酒泉东大街凝德堂	
李子清	28	甘肃陇西	小学毕业	曾充保长	粮食公会书记	陇西西街粮食公会	
李兰荫	25	甘肃酒泉	师训班毕业	曾充教员	酒泉总工会书记	酒泉东大街凝德堂	
周颂尧	18	甘肃天水	县中毕业		天水酒业公会书记	天水忠义巷56号	
赵禹承	25	甘肃天水	小学毕业	曾充排长副官等职	天水南果业书记	天水伏羲城储蓄巷	

中毕业资格或曾在财务行政机关服务两年以上经审查合格者方可参加训练”^[20]。对“有不良嗜好者，在地方办理公务有劣迹者，曾受过处分者以及身体衰弱或有疾病者，有上述情况之一者不得保送”^[21]。而“各级训练机关调训阶层，荐任级以上人员由中训团党政班调训，委任级人员由省训练团调训，自治人员由区班或县所调训”^[22]。此外，各省可根据本省具体情况拟定训练法规。

受训学员需编制个人简历表、同学录、通讯录等，以便统一管理。训练届满，经考试合格者，仍回原单位任职或分发任用，对不合格者，则通知原单位免职或不予分发^[23]。简历表主要对受训学员姓名、年龄、籍贯、学历、经历、现任职以及永久通讯处等信息进行登记。以西北干部



训练团第一大队第三队政干班第六组学员简历表为例(见“表1”)。

从“表1”看出, 受训学员年富力强, 有一定的文化背景, 这有利于较快掌握训练内容; 且有较丰富的地方任职经验, 具备一定的行政业务技能, 经过训练可成为地方建设的中坚。

2. 训练教材及其编审

为更好指导受训学员完成训练科目, 西北干部训练团成立学员教材编审委员会, 负责编审教材工作, 其中编印团长训词及政治军事训育教材38种(如“表2”所示)。

表2. 西北干部训练团受训学员
训育教材统计表^[25]

种类	团长训词	主义及哲学	团育教材	政治教材	军事教材	合计
种数	11	3	5	7	12	38
册数	33000	9000	15000	21000	30000	10800

西北干部训练团成立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辑西北研究各类丛书, 如《勘定新疆记》《青海地理与民族研究》《蒙古问题研究》《哈萨克族研究》《新疆问题研究》《甘肃药材研究》《西北土壤研究》《西北农业研究》《西北水利研究》《西北交通研究》等。训育丛书包括《团长训词》《如何做人与做事》《保甲与农务技术》《团长对青年干部之指示》等。隶属于西北干部训练团的现代西北月刊社创办《现代西北》期刊, 内容涉及西北问题的各个方面, 每期有专题研究, 并规定“除西北问题以外, 对于其他有关抗建的各种问题, 均应以检讨与研究”^[26]。每期印刷500册, 赠阅及发行全国各地, 并备学员课外阅读。就具体训练班(所)而言, 学习科目各不相同, 选用的训练教材也不尽相同, 如财政会计人员需要学习应用算数、财政概论、簿记及会计、政府会计及实习、统计方法、会计法规、岁计制度、经济概论、审计学等内容^[27]。

3. 训练课程及科目

训练课程主要包括: 精神训练、政治训练、

军事训练、业务训练等。

在抗战建国的形势下, 国民党希望重塑党政干部之精神, 以期达到“必使人人能够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尽心尽力, 尽其才智, 自动为国家服务, 自动为民族牺牲, 推至于使四万万人心合为一心, 四万万人的精神集中于复兴民族这一件事”^[28]。精神训练要求“在思想方面, 培植受训人员, 对于三民主义及总裁训示, 有坚定的信仰, 在生活方面养成受训人员, 简朴勤劳及集团生活的习惯, 在行动方面, 涵养学训人员有迅速敏捷与操守纪律的精神”^[29]。根据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规定, 各省干部精神训练课程作为一般训练课程讲授。讲授内容包括, “总理遗教、总裁言论、精神讲话、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要、中国国民党政纲政策决议、党员须知、党务工作要领”^[30]。此外, 在精神训练科目中, 精神讲话作为讲授内容之一, 一般在总理纪念周、受训学员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各种纪念日或升降旗时举行, 通常由团长、副团长或教育长进行精神讲话。

政治训练的目的在于灌输受训人员必要之政治常识, 能够奉行政府命令, 唤起民族意识, 并激发抗战建国的热情。其内容共分十科: 机关管理、西北情况、国际现势、敌情研究、重要政令、政纲政策、行政三联制、党员须知及研读教材等。军事训练要求受训人员获得一般军事常识, 同时锻炼其体魄, 使其有坚决英勇的志气, 冒险犯难, 担当革命的精神。训练内容除军干班之军事学术必须教授外, 其他一般学科共六科, 即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内务规则、陆军礼节、军事讲话等。业务训练目的在于增进受训人员的工作技能, 并熟谙管理人、时、事、地、物各种法则, 以及掌握教育民众、指导民众、保卫民众及发动民众的要领, 其内容视训练班的性质而异。西北干部训练团将受训干部分为党务干部、政治干部、军事干部及教育干部四类, 分别设立班级, 统一训练。党务干部训练注重学习中国国民党党义研究纲要, 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施秩序, 改进党务与调整党政关系, 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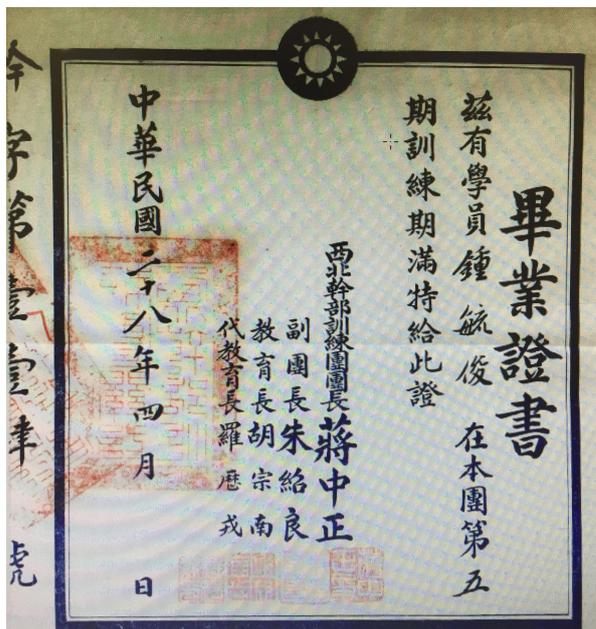


层组织及工作等。政治干部训练侧重学习县各级组织纲要，地方财政，合作常识，保甲与户籍，警卫常识，兵役法规，粮食管理，地方教育行政，社会调查与统计，及公共卫生等。军事干部需掌握典范令及战术，筑城兵器，交通知识及摘要与游击战术等。教育干部训练着重国语国音练习，算数，史地，教育概要，教育心理，学校行政及各科教学法等^[31]。

4. 教学方式与考核

教学方式采用并进式，教材的讲授要求以问题为中心，而业务课程更着重解决实际问题。要求受训人员在职务上遇到的困难，在课程讲授的过程中都能得到解决，并能熟练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课程注重实用，在教学时要求学员进行现场观察，注重实习锻炼，达到讲授与实训合一的目的。对于军事学科，要求每科都要仔细讲授，尤其是军干班课程，讲授时需详尽缜密，使受训学员能够熟练运用相关军事理论知识。受训学员结业成绩需要考核，其中政治课程占20%，军事课程占20%，业务课程占40%，训育课程占20%。训育实施成绩核算，以军事管理占30%，体格检查占10%，训育实施占60%。又规定学员平时成绩与结业成绩，为60与40之比，学员以结业论文作结业成绩者，平时成绩占70%。结业论文占30%。考查成绩均用百分法，以100为满分，60分为及格，不足60分为丁等，60分以上不足70分为丙等，70分以上不足80分为乙等，80分以上为甲等。平时考查由任课教官在授课时考查，以口试或笔试方式为主。结业考查在学员结业时举行，结业考试由任课教官出题，考试委员会监考，核算成绩绩点及等次。教学方法采用演讲、问答、自学、辅导、及时讨论等四种形式。^[32]考核的结果，应由团内教务训导军训人员及班（组）主任或教官会商决定，由训练团填写受训人员名单分送其应服务机关及主管机关参考^[33]。

综上，通过对西北干部训练的実施情形的梳理，可知学员的选拔较为严格，在受训前需要对



西北干部训练团给受训学员的毕业证书

学员身份进行甄别，以及过往经历进行调查和备案，且受训干部以地方各级行政干部为主。在训练教材的编审与选用方面，不仅有中央性的教材，也有大量反应西北政情、社情的教材，这有利于受训学员掌握地方基本情况，以便更好地建设地方社会，增强其业务能力。此外，受训学员要学习精神、政治、军事、业务等训练课程，力图重塑干部精神，灌输政治常识，锻造体魄，提升业务技能。最后对受训学员需要进行严格考核，以成绩优劣为调任选拔的依据。西北干部训练的實施情形反映了国民党干部培养体制趋于规范化、制度化，也成为其培养和训练干部的基本方式。

三、干部训练的成效与桎梏

若仅从训练数量而言，隶属于中央训练机关的西北干部训练团，训练成绩较为显著。根据国民党训练委员会统计，西北干部训练团自成立以来，举办党政军教训练班38期。1942年及1943年分别在甘肃酒泉及绥远伊盟附设第一、第二边疆青年训练班，（1944年前者改为河西训练所，后者改隶绥远省训练团）共办七期，训练502人，全团合计训练22743人。我们再以下表为



表 3. 全国各级训练机关分年度训练人数
(1937—1944) [34]

年度	总数	中央训练团	西北干部训练团	战干团	新疆分团
1937	284	--	--	--	--
1938	6092	3555	2251	196	--
1939	13316	3420	5195	4701	--
1940	22006	5562	4074	12370	--
1941	15973	6498	3038	6437	--
1942	11350	6304	3066	1980	--
1943	17466	5659	3251	7912	608
1944	12445	4097	1868	5611	869
八年合计	98932	35095	22743	39207	1477
制表日期:1945年4月18日					

例，考量西北干部训练团的成效。

斯时国民党中央直属的训练机关包括中央训练团、西北干部训练团、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和新疆分团。从所训人数来看，西训团居第三位，占训练总数的 23%，其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

虽然从实际训练效果来看，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但是甘肃省自新县制实施以来，干部缺额甚大。因此，省政府规定：“凡完成新县制之乡镇公所，其干部一律用新人，即乡镇长副及专佐干事。皆系从新训练之人员，由县长就本县中遴选优秀青年，保送来省，由省政府委员到西北干部训练团代为训练” [35]。时任甘肃省主席谷正伦认为西北干部训练团的核心任务就是供给新县制实施所需要的人才。 [36]为配合新县制的实施需要，甘肃省规定对新县制所需干部进行严格训练，其中西北干部训练团负责思想训练、军事训练，行政训练，由民政厅指派各行政管理部门主管人担任。此外，各县凡是保送至西训团训练的人员必“须通过甄审合格方得入团受训”，集中训练三个月后，由西北干部训练团就受训人员在受训期间的成绩评定等次后，“递交省政府分发各县政府任用之。其最优者以乡镇长或副乡镇长任

用，余以乡镇干事任用” [37]。

据统计：“1941年至1943年省级干部计划训练10184人。至于县级训练，则专门设立县级训所，县级人员训练由各县组织干部人员训练所办理，甘肃省先后成立皋兰等18处县训所，兰州等20所，榆中等11所，共应训练各项人员95187人，截止1943年底，已训练70352人，占应训练人数的73%。在已训练人数中，内保长占8.2%，甲长占80%，保队附占5.7%，其他（包括小学教师，及合作，社会等，警卫等各项人员，以及盐工）占6.1%” [38]。

总体上来说，西北干部训练团在甘肃的效果彰显，但是在宁夏和青海则难如人意。西北干部训练团成立的目的之一是消解西北诸马军阀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但事与愿违。1940年马鸿逵成立宁夏省地方行政人员训练团，自兼团主任，该团将全省各机关公务人员及县、乡自治人员、保甲人员，分期集训，全省两千余人，每月一期，分三期训练完毕。训练内容着重于对长官之信仰和忠诚，要求全省党政人员都为马鸿逵一人效忠 [39]。青海马步芳利用训练团副团长的名义，自行成立青海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对党政科长以上人员、地方头面人物和行政、教育、警察分三期进行训练。各期训练的学习内容主要有：《青海省保甲法规》《总理遗教》《蒋总裁言论》《马主席言论》等。而在训练中，“马步芳特别强调政治思想上要形成‘一个思想、一个团体、一个领袖’的信念，要求人人树立对马氏的绝对崇拜，将个人的思想、行动都统一到马氏的意志中去” [40]。显然干部训练进一步加强了马氏家族的政治势力。时人评论道：“这种训练各地方当局不乏以之敷衍之功令，或粉饰治绩者。更有野心之徒，以主办训练机关为培养私党，布置爪牙，以广置一己之势力者，反为行政上的浪费，或弊政发展的源泉矣。此外，以训练为护符，以同学会等组织为声援，勾结土劣，危害地方者，尤比比皆是。” [41]1947年，钱实甫在《干部国家化 政府民主化》一文中指出：“照现在的情况来说，



无论军队、文官、教师，都同样的处于党派的、人事的支配之下，绝非国家的干部。我们目前也有各色各样的干部训练机关，军长可办，县长可办，任何有权有钱的人都可以主办。这样的干部，老实说则只可以当成是私人的、一党的爪牙，与国家干部无干。这种干部，既非由于正式的教育机关所培养，又非由于正式的考试机关所甄拔，更非由于正式的铨叙机关所审覈，其任免调迁、升降的大权，完全操于训练者手里，则自然只会向他们的‘主子’效忠，而无视国家。这种风气，确属于对于教育部、考试院、铨叙部一个大大的正面讽刺，而把五权制度不看在眼里。我们所说的‘干部’，绝非指此而言。”^[42]该文可谓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当时国民党在各地举办的干部训练的弊端，而处于西北的干部训练亦是如此。

四、结语

始于抗战时期的国民党西北干部训练，其目的既是为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也是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国民党希冀通过对干部施以精神、政治、军事和业务等训练，力图塑造忠诚的党政干部，强化基层干部对中央政权的普遍认同。进而稳定其统治秩序，使西北地方社会纳入国家政治轨道。同时，为瓦解与分化西北地方军阀固有力量，消解其在西北社会中的影响，干部训练成为主要手段之一。然而，面对抗战时期复杂的西北局势，国民党并没有对诸马军阀的干部实现有效的训练，青海和宁夏仍旧是由马家军阀掌控，中央与地方暗中博弈仍在继续。从训练实施情形来看，国民党中央西北干部训练制度得不到长期而有效地强化，弱化了干部训练的成效，这无益于国民党干部训练体制的完善和干部人才的培养。值得注意的是，为配合新县制的实施，西北干部训练团抽调大量地方干部进行训练，大批干部受训后充任地方基层干部，成为维护地方统治的重要力量，保障了抗战后方的稳定，这对地方建设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是国民党控制西北地方社会的有益尝试。但是，这种短期实施的

训练，对于地方官吏素质的提升并不明显，基层公务人员缺额仍旧较大，基层社会管理成效仍旧不彰。

注释：

目前学界对于国民党干部训练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论著有：曹淑瑶：《台湾省训练团研究》，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研究所2000年硕士论文，该论文2005年由台北稻乡出版社以《公忠体国：台湾省政建设人才的培训（1956—1997）》为书名公开出版；冯启宏：《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的干部训练：以中央训练团为中心的探讨（1938—1945）》，台湾政治大学史学研究所2004年博士论文；孟静：《民国河北省训练团评析》，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6年硕士论文；黄宗华：《中国国民党江西干部训练研究（1932—1949）》，南开大学博士论文，该论文2013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化贵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省干部训练研究（1939—1949）》，华中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目前关于国民党西北干部训练的研究尚未有专门研究成果出现。

参考文献：

- [1][6][34]七年来之训练工作[M].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编印,1945:3,4,4.
- [2][4] 李少陵.西北干部训练团的过去、现在及未来[J].西北干部(创刊号),1939(1):4.
- [3][12] 杨者圣.随同蒋经国的西北之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30.
- [5] 三十年度本会业务概况[J].训练通讯,193(18):2.
- [7] 刘进.中心与边缘:国民党政权与甘宁青社会[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142.
- [8]谢觉哉日记(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23.
- [9]朱绍良.当前的形势与党组织任务[N].甘肃省人民政府公报,1938-10(459):88-89.
- [10]蒋介石日记(手稿 影印件)[M].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1942-06-30.
- [11]马鹤天.开发西北与中国前途[J].西北问题季刊,1935(3):17-18.
- [13]李烛尘:西北归来[M].重庆:重庆文化印书馆,1945:



182—183.

[14]何耿光.新疆过去与今后的干部训练[J].新疆, 1994(1):183—86.

[15]马继援.陇东区在乡军官训练班结业纪念同学录[M].陇东区在乡军官训练班编: 1939:5.

[16][17]黄哲真.论县人事[J].甘肃县政旬刊, 1939(7):1,2.

[18][19]蒋介石.蒋团长在西北训练团开学典礼训词[N].甘肃省政府公报, 1938:49,62.

[20][27]甘肃省会计人员训练所规程[M].兰州:甘肃省图书馆藏, 1936:17,18.

[21]甘肃省乡镇人员训练暂行办法[M].兰州:甘肃省图书馆藏, 1940:47.

[22]段锡朋.中央训练委员会第三十年度工作报告与检讨[J].训练通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编印, 1939(17):1.

[23]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兰州市人事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兰州市志:第49卷 人事志[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6:344.

[24]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西北干部训练团第一大队第三队政干班第六组学员简历表[A].兰州:甘肃省档案馆藏 档号 015—002—0121—003.

[25]现代西北[J].中央训练委员会西北干部训练团现代西北月刊社编行, 1944(5):14.

[26]顾希平.《发刊词》[J].现代西北(创刊号),中央训练委员会西北干部训练团现代西北月刊社编行, 1941:1.

[28]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第14卷 M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4:176—177.

[29][31][32]汤祖壇.一年来本团训练之概况[J].现代西北.中央训练委员会西北干部训练团现代西北月刊社编行, 甘肃省图书馆藏, 1944(5):13,14,15.

[30]修订各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训练课程项目一览表》[N].中央党务公报, 1942(7):24.

[33]各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机关与党政机关联系办法[J].训练通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编印: 1939(13):2.

[35]甘肃省新县制实施概况 [M]. 甘肃省政府编印: 1942:23.

[36]谷正伦.治甘言论(三)[M].甘肃省政府编印:1943:98.

[37]关于实施新县制各项章则办法及计划全案(油印本)[M].甘肃省政府编印:1942:13.

[38]肃省政府三年来重要工作报告[M].甘肃省政府编印[M].1944:65.

[39][40]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538.

[41]陈伯心.中国县制改造[M].重庆: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1942年:499.

[42]钱实甫.干部国家化、政府民主化[J].世纪评论, 1947(9):7—8.

注:本文为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北抗战大后方文献资料整理研究”(项目编号:16AZD037);2015年西北师范大学重大培育项目“西北抗战大后方文献资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SKZD15003);宁夏回族自治区2017年优秀青年培育项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北干部训练研究——基于对‘西北干部训练团’的考察”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龙(1992—),男,汉族,宁夏固原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尚季芳(1976—),男,汉族,甘肃张家川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区域经济社会史。

(责任编辑:马宝明)